

【澳】布赖恩·马丁 著

周育民 等译

上海青帮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BRIAN G. MARTIN



上海三联书店

【澳】布赖恩·马丁 著

周育民 等译

上海青帮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BRIAN G. MARTI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青帮/[澳]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0

ISBN 7-5426-1705-2

I. 上... II. ①马...②周... III. 帮会-

上海市-现代 IV. 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8899号

上海青帮

著 者/[澳]布赖恩·马丁

译 者/周育民等

策 划/吴士余

特约编辑/征 宇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2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5000

ISBN7-5426-1705-2

K·95 定价 18.00 元

献给安利雅

鸣 谢

本书缘起于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和骆惠敏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1920 - 1937 年的上海青帮：杜月笙的崛起》。我非常感谢两位在这个课题多年酝酿的过程中所给予的慷慨支持、指导和鼓励。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许多年以前，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还在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作为学生听 Jack Gray 教授讲课时，深受感染，是他首先鼓励我钻研中国历史的。

我特别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唐振常教授，他对我在上海的实地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还要感谢原上海市档案馆馆长韩伟之和工作人员对我在档案馆阅档时所提供的帮助，当然，我也要感谢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于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助我找到驻沪总领事馆的文档，我也深表谢意。

我特别要感谢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对我的青帮研究工作的长期关注，我还要感谢他和高家龙（Sherman Cochrane）、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 1988 年 9 月在上海召开的上海史讨论会。这次会议给了我与同行的中外学者交流有关上海近代史不同方面看法的无可估价的机会。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白吉尔（Marie - Claire Bergère）教授。我还要感谢孔如轲（Nick Clifford）教授，他慷慨地让我分享他对于涉及中国的法国外交文件的渊博知识。

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深深受惠于许多

同事的友谊和启发,特别是 Antonia Finnane, John Fitzgerald, Ann Gunn, Jeniffer Holmgren, Pauline Keating, Brian Moloughney, Terry Narramore, Warren Sun, Esta Unger 和叶晓青。

本书是在我已经发表的若干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发表过这些论文的杂志、专集的编者,我想他们会同意我采用其中部分内容的。本书第一、二章的内容原本是《青帮的起源及其在上海的兴起,1850 - 1920》(载《东亚历史》第2期,第67 - 86页);《军阀与帮会:1926年前的上海鸦片贸易与三鑫公司》(载 John Fitzgerald 编《1923 - 1937年的国民党人与中国社会论文集》,第44 - 71页);第三、五章取材于《“与魔鬼签订的合同”——1925 - 1935年青帮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载魏斐德、叶文心编《客居上海》第266 - 304页);第七章则取材于《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1927 - 1937年杜月笙与上海政治》,(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4期第64 - 91页)。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安利雅(Arja Keski - Nummi)。没有他们的无怨无悔的支持,我是无法完成这项课题的。

本书若有错误之处,自然由我负责。

前 言

20 世纪初叶是中国大转变的时代,它见证了传统中国政府的解体,催生了各种抉择的探索。这个过程经历了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巨变,触及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这些巨变最显著的地方是中国的大城市,而在这些大城市中,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在这座城市中,新的阶级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政治组织发展起来了,新的大众媒介方式(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广播)确立了。

然而,上海城市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它不仅受到了新兴的社会力量的推动,同时还见证了某些传统社会组织的脱胎换骨。这些传统社会的因素并非仅仅是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的残余,相反,它们在许多场合下,与生气勃勃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交互作用而繁荣起来,并且影响到中国城市中出现的“现代”社会的形态。这种现象的众多范例之一就是中国的秘密结社,这种最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却能成功地适应了条约口岸的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在兴起的现代都市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秘密结社在 20 世纪上半叶都市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外,西方对于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很少注意这种现象。由于最初受到 20 世纪 60 年代谢诺和戴费琳著作的强烈影响,这项研究从广义上说,集中在两个课题上:秘密结社与农村社会的相互关系;辛亥革命前人民大众反抗剥削中秘密结社的政治作用。这些著作

所持的观点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路数,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即秘密结社是人民大众反抗封建国家的催化剂,因此,被官方认为是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进步”组织。对于其他历史学者而言,秘密结社的重要性在于,分析它们的活动有助于解释农民为什么要起义这样的大问题。

少数学者从上海、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国民党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在天津执政等其他课题的调查资料,探讨了中国城市秘密结社的某些方面。如果没有对秘密结社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作深入探讨,中国城市现代历史的一些关键领域是无从下笔的。

由于缺乏城市秘密结社历史的学术研究,那些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图书如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潘翎的《寻找旧上海》成了畅销书,这两本书生动鲜活地描述了青帮及其大亨杜月笙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活动,但均非(亦不要求成为)史学著作。尤其是西格雷夫的叙述,以其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历史和蒋介石篡权(他认为应归功于杜月笙)的观点,为了耸动视听而牺牲了事实。相反,潘翎的著作则较为稳妥地凭借第二手资料,尤其是章君谷和徐铸成的杜月笙传记,对杜月笙的生平作了远比西格雷夫中肯的叙述。然而,她的观点依然近于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作品也颇有传统中国小说的演义风格,即按情节需要重组历史事件。

在研究上海青帮活动的方法上,尤其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最强大的青帮组织的方法上,本书十分关注中国城市型秘密结社的作用及其与民国时代国家体制的关系等问题。它特别注重由法租界青帮大亨所控制的上海青帮的一大团伙,并对其中最显赫的杜月笙以更多的关注。通过对于上海青帮的缜密研究,本书试图展示秘密结社是具有应变力的社会组织,不仅能

够成功地适应现代化都市社会的复杂环境,并且能在这种社会中展现其强大的势力。

由于对于城市秘密结社注意不够,西方史学家对于 20 世纪青帮缺乏系统研究。部分涉及这一问题的重要学术研究是汪一驹和乔纳逊·马歇尔在 1967 和 1968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相对而言,两者成为目前这项研究的起点。

相反,在中国,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上海秘密结社历史的兴趣明显地增强了,这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学界思想解放的进展:对于这种类型的课题的纯历史学探讨有了更为宽松的见解,档案和文献也向历史学家开放了。对上海秘密结社研究的一项重要史料就是 1986 年出版的《旧上海的帮会》,这是一本原秘密结社成员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国民党政治、工会领导人写的回忆录,它为上海秘密结社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历史学者广泛地引用。

近年来更重要的发展是 1991 年出版了与上海秘密结社有关的三本著作。一是苏智良、陈丽菲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对 19-20 世纪上海秘密结社的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二是胡训珉、贺建的《上海帮会简史》,对 19 世纪中叶到 1949 年上海三合会和青帮组织的演进作了平实的叙述;三是郭绪印主编的《旧上海黑社会秘史》,对民国时期的上海秘密结社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侧重于青帮大亨杜月笙。另一部较多涉及上海秘密结社的重要著作是 1993 年出版的周育民与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这项史料丰富的关于清代到民国秘密结社的研究成果无疑是这一个课题的典范之作。

我的研究还得益于中国学术机构在近 10 年来的“开放”。如果不接触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尤其是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所收藏的史料,这项研究的资料基础将会非常薄弱。对这

项研究同样重要的是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刊印的青帮手册(所谓“通草”),其中提供了丰富的有关青帮的仪式、历史传统、组织结构甚至成员名单等资料;还有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特务股的档案,以及极为丰富的有关上海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史料。其他重要的史料来源还有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文件,中文和西文的报刊以及回忆录,最著名的是《文史资料选辑》,特别重要的当然是《旧上海的帮会》了。

本书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上海青帮的分析是围绕着五个论点而演绎的。首先,民国时代秘密结社是能够做到所谓“与时俱进”(contemporanéité)的。秘密结社是具有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具有很强应变能力的团体。事实上,这项研究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像青帮这样的秘密结社,并没有墨守封建的成规,而是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能积极地应付社会政治变迁的挑战。

其次,上海华洋混杂的特点以及外国租界的殖民权力构造,特别有利于秘密结社的活动。确实,在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存在着三个分裂的司法管辖区——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三个互相排斥、竞争的国家管辖权的存在非常有利于青帮组织的扩充及其所控制的鸦片交易的繁荣。同时,外国租界当局出于治安的需要,尤其是对于控制激增的华人的需要,与某些势力强大的青帮大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比如让后者到租界巡捕房华捕队任职等等。换言之,青帮大亨因其强暴势力对外国租界作出了有效贡献;作为回报,其非法勾当也得到了官方的默认。事实上,有些大亨还能将其为外国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功能转变为实在的政治力量,发生在法租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关系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帝国主义机制在上海运作的性质。

第三,鸦片交易对于青帮团伙获取金钱和权势至关重要。为

了争夺这个赚钱的交易份额,他们相互之间,与其他秘密结社之间展开了无情的争斗;法租界的青帮大亨以其才能控制了鸦片交易,这便奠定了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兴起的有组织犯罪现象的基础。因此,鸦片交易的安全性成为决定法租界青帮团伙对于上海华界当局和外国当局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观察青帮与主体社会阶级、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其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由上海这一移民城市而无高度发展的凝聚力所造成的;它对与包工制度有关的包工的控制决定了它与工人的关系的局限性。各种青帮团体与华人资本家的关系最初仅仅是前者犯罪活动的一种功能,最显著的就是进行敲诈和绑票。此后,尽管这种关系的消极面依然十分重要,但它渐渐地退缩到了其他积极的因素的阴影之下,反映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这种新的关系,最初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青帮有效地控制了猖獗的非法鸦片交易以后,与中国资本家的某些头面人物争夺在法租界的权势。这种新关系的第二阶段,始于1932年的危机,某些青帮大亨参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一些政治团体,最著名的是上海地方协会。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关系纳入到了国民党架构并控制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政治机制之中。

最后,对于鸦片交易的控制和介入工人和资产阶级之中,使青帮大亨们得以参与华界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青帮大亨们不仅与军阀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而且还能与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攀上关系。他们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就是参与了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的“四·一二”反共政变。就青帮大亨们与1927-1928年以后国民党建立的新国家体制的关系稳定而言,青帮大亨们当时对于蒋介石的支持虽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这种复杂关系是由多种因素造成并且在

南京政府的前 10 年中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而其关节点则是 1932 年由上海事变引发的危机。危机刚过去,杜月笙就成了上海滩最强有力的青帮大亨。他充分地参与了南京政府创建的新的政治合作主义机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他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杜月笙成了有自我利益的重要政治人物。

通过这些论题的探讨,本书分析了 20 世纪上半叶在上海社会和政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帮的作用。确实,上海的青帮为秘密结社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实例,即通常被视为本质上属于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能够积极地应对和抓住中国现代都市社会所提供的机遇。在 20 世纪 20 年代,通过创立犯罪辛迪加制度,青帮进而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这种组织是如何使其成功地转变为适应现代条约规定口岸的中国居民中的一种异质因素的。在这方面,本书关于上海青帮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复杂进程或许也会有所裨益。

目 录

鸣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帮的源流	1
青帮的起源	2
青帮的组织结构	11
从青帮在上海出现到 1920 年	20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主要青帮	29
第二章 鸦片的功能	39
鸦片与上海:从合法到禁止(1858 - 1919)	40
帮会与鸦片走私(1912 - 1919):大八股党的角色	43
法租界青帮、大八股党和安福系的鸦片垄断(1919 - 1924)	46
三鑫公司的创立(1924 - 1925)	53
三鑫公司的优势(1925 - 1927)	58
第三章 上海青帮与法租界的关系	62
黄金荣和法租界巡捕房	62
权利的竞争:华人天主教徒的“绅董派”	67
1925 年 4 - 5 月间青帮与法租界当局的交易	69

“绅董派”在法租界继续走红(1924 - 1927)	73
法租界青帮内部势力的消长	76
第四章 在中国革命中	80
1926 年前青帮与国民党的关系	80
青帮与中国共产党(1921 - 1925)	83
青帮与革命政治:1926 年 7 月 - 1927 年 2 月的北伐	89
青帮与革命政治:准备反共政变(1927 年 3 - 4 月)	103
青帮与“四·一二”政变	109
余波:青帮和“白色恐怖”(1927 年 4 - 8 月)	114
第五章 与恶魔签订的合同	119
法国当局、青帮及 1927 年 1 - 4 月的事态	119
“四·一二”政变后的鸦片和租界治安	122
青帮在法租界里政治势力的巩固	124
青帮与法租界社会和工业秩序的维持:	
法电工会(1928 - 1931)	129
1931 年法租界的权威危机	136
法国当局反对杜月笙(1932 年 2 - 7 月)	139
法租界法国权威的重申(1932 - 1935)	142
第六章 不稳定与危机	146
鸦片在国民党与青帮关系中的作用(1927 - 1931)	146
1928 - 1931 年青帮大亨与国民党政治	153
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1931 年 6 月杜家祠的落成典礼	156
1932 年危机:国民党与上海上层人士	161
杜月笙与 1932 年危机	165

第七章 黑帮政客：杜月笙和国民党政府	170
国民党的阶级合作政治	171
杜月笙和 CC 系的关系	175
杜月笙与劳工控制	182
杜月笙和上海资产阶级政治：上海地方协会	186
杜月笙和鸦片	192
恒社	195
杜月笙在上海青帮中的优势及其与洪帮的关系	197
 第八章 帮会企业家——杜月笙和上海经济	 206
序幕：法租界青帮和上海华商界的关系（1928 - 1931）	206
杜月笙经济势力的巩固（1932 - 1937）	210
 第九章 结论	 231
与现代政权的关系：意大利的黑手党	233
帮会企业家：美国的有组织犯罪	236
殖民地结构和民族革命：雅加达的帮会	240
“儒教帮会”：日本的“押苦札”	242
 参考书目	 246
译后记	280

第一章 青帮的源流

20 世纪上半叶,青帮在当时的外国人和中国人眼中是中国最著名的秘密结社之一。虽然在外国人看来,青帮活跃的主要中心是天津、上海等这些条约口岸,然而中国人却不能逃脱它无所不在的势力。尽管普通百姓和官方都知道青帮的存在,但是由于神话的渲染和故意的混淆,对于它的起源和发展人们还非常模糊。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此同样也模糊不清,并且还引起了相当多的有关青帮起源的争论。比如,青帮史专家胡珠生认为,在中国近代秘密结社的历史中,青帮史中的问题最为复杂。然而另一位青帮史专家陈志让则认为,青帮历史“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物,其中的虚构超过了事实”。^①

然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档案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澄清了青帮的起源。^② 简言之,这些研究表明,青帮的近代形式是从

① 胡珠生:《青帮史初探》;陈志让:《义和团的起源》。青帮史起源的争论详见布赖恩·G·马丁:《上海的青帮:杜月笙的崛起》,第9-10页。

② 这些学者包括:胡珠生、李世瑜、蔡少卿、马西沙、程献、韩秉方、周育民。马西沙和韩秉方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尤为重要。下面的讨论以下列著作和戴维·E·凯利、渡边惇、戴玄之的著作为基础。李世瑜:《青帮早期组织考略》、《青帮、天地会和白莲教》;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第79-86页;马西沙、程献:《从罗教到青帮》;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242-339页;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26-41页、第223-288页;戴维·凯利:《庵堂与漕船:18世纪的罗教与水手行帮》;渡边惇:《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清末民初的青红帮》;戴玄之:《青帮的源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活跃在江苏苏北地区的秘密会社安清道友（或称安清会）转变而来的。^① 安清道友吸取了当时盛行的佛教教派罗教（罗祖教）下属的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行帮的传统。同时它还与那些活跃在江苏北部的哥老会（兄弟会）成员结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安清道友为媒介，青帮吸收了罗教和哥老会两者的传统。因此，近代的青帮从根本上说，是安清道友与哥老会混合的产物。

青帮的起源

青帮的祖师出自罗祖教系统，这是晚明一个世俗的普渡众生的佛教教派，由佛教支派白莲教发展而来。教祖罗清强调个人参悟的重要性。这种参悟，在指导对士人以外的民众时，是一种许诺凡夫俗子可以步入宗教殿堂的强有力的鼓动。^② 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罗教传遍了大江南北。

据 18 世纪中叶以来的清朝官方奏折可知，罗教是由翁岩、钱坚（均为直隶密云人）和潘清（江苏省松江人）三人在 17 世纪早期传入兵丁和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的。^③ 他们三人后来被尊为“三祖”，而且到 18 世纪，三祖教已成为漕运水手中的罗教支派了。

18 世纪初，南方漕运的起点——杭州已经成为漕运水手行帮

① 关于苏北地理位置和概念的讨论以及它与江南、上海的关系可见韩起澜：《族群形成：上海的苏北人》，第 18—35 页。安东尼亚·冯南在《歧视的起源：晚清的苏北难民》中，在探讨富有启发意义的有关经济落后的苏北时采用了“内部殖民”这一概念作为诠释苏北经历的手段。

② 欧大年：《中国民间教派文学的价值：明清宝卷》；亦见其《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③ 李世瑜：《青帮早期组织考略》引 1786 年闽浙总督崔应阶审问罗教成员的奏折。